

# 從南京的“餘震”到悉尼的“暖陽”

田沈生

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，法律與道德始終是一對相生相伴的舵槳。法律負責劃定社會運行的底線，而道德則指引著人心向善的航向。然而，當這兩者在某個瞬間發生猛烈撞擊時，留下的往往是經年不息的社會餘震。

當今，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下，目睹老人跌倒，“扶不扶”似乎已經從一個簡單的道德選擇，演變成了一場複雜的心理博弈。

## 冰封的起點：南京街頭的“常理”推斷

時光回溯到二十年前，南京的一場法官質問，成了中國社會道德討論中一個繞不開的痛點。那個被稱為“彭宇案”的案件，細節至今令人唏噓。當一名男子出於善意扶起摔倒的老人，卻被反誣為肇事者並推上被告席時，社會公眾原本以“農夫與蛇”的寓言，對老人及其家屬不道德的指控，不約而

同地發出一致的譴責。然而，法官在庭審中那句石破天驚的質問：“不是你撞倒的，你為什麼要去扶？”一石激起千層浪，瞬間引爆了輿論。

這句話背後潛藏的邏輯令人心驚：它預設了一個極度自私的“理性人”，即在沒有利益相關的情況下，任何“見義勇為”的行為都是不符合“常理”的。這種令人不解的邏輯，將人類出於本能的善意擊得粉碎。人性的光輝被扭曲為“百口莫辯”的“罪證”。

其後果，顯而易見。在那之後的數年裡，目睹老人跌倒，“扶不扶”變成了一個沉重的社會課題。由於擔心被誣陷、擔心法律無法給予善意足夠的支撐，人們在倒地的弱者面前開始變得遲疑、退縮，甚至視若罔聞。這種“防禦性冷漠”並非天生，而是一種在極端個案影響下產生的“社會心理防禦”。南京扶人事件像一粒

被播下的種子，催生出了大面積的“攙扶恐懼症”，如同一個冷酷的枷鎖，冰封了無數人心中的善念。

## 溫暖的對照：悉尼月臺的“本能”瞬間

日前，我在悉尼中央火車站目睹了截然不同的一幕。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月臺，一位衣著整潔，個頭不高，白髮蒼蒼的西人老婦正在等車，平靜而祥和。就在列車停穩開門的一瞬間，幾個嬉戲打鬧，急速沖下的中學生，突然打破了這份寧靜。其中一個孩子的書包帶誤刮到了老人的手臂。老人猝不及防，身體瞬間失衡向後仰去。在那個千鈞一髮的時刻，月臺堅硬的水泥地面立馬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威脅。

就在老人即將倒地的一刹那，一名身著工裝的大漢出現了。他沒有片刻的遲疑，沒有進行任何“風險評估”，完全憑藉一種保護弱者的

本能，用那雙佈滿刺青、看起來甚至有些粗獷的手臂，死死撐住了老人。巨大的慣性讓兩人同時跌坐在地上，大漢的身體成為老人最堅實的緩衝墊，避免了後腦著地的致命危險。

接下來的畫面，尤其令人感動。周圍等車的男女老少沒有袖手圍觀與議論喧嘩，而是迅速靠攏，眼神裡充滿了焦慮：有沒有受傷？要不要聯繫家人？需不需要救護車？關切之聲此起彼伏。老婦人仰頭環顧四周，她拍了拍手上的灰塵，微笑著對那位刺青大漢說：“我很好，謝謝你！”從表情上可以看出，眾人都為老人的安全，鬆了一口氣。難得的是，那幾個闖禍的學生也沒有逃避，他們擠回人群，紅著臉誠懇道歉，並主動幫老人把行李安置到車廂裡，還在不停地說對不起，老人則報以寬容的微笑，向他們揮手道別。看到這溫馨的一幕，不

禁令人動容。

這兩幕跨越時空的對比，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：法律是社會的底線，而關愛與信任是社會的生命線。南京事件提醒我們，當司法的邏輯背離了人性的光輝，它可能會冰封一個社會的良知。而悉尼月臺的故事則告訴我們，一個文明健康的社會，是由無數個“理所應當”構成的一——理所應當去救人，理所應當去感激，理所應當去承擔責任。

在悉尼的這個月臺上，沒有“為什麼要去扶”的質疑，只有“幸好扶住了”的慶倖。大漢的刺青與他的善良形成了迷人的反差，而孩子們的擔當與老人的寬容，無疑是在提升了一個社會的文明與健康的程度，增強了社會的幸福感。難怪，在世界宜居城市的排名中，悉尼總是名列前茅。

## 法律與道德：如何安放我們的善意

將這兩幕放在一起審視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地域的區別，更是社會契約中“信任”一詞的不同語境。

南京案的悲劇在於，當法律過度依賴“利益與責任”，並以此去揣度人心時，不可避免地誤傷了社會的整體道德觀，失去了維護正義，維護人性善意的初衷。而悉尼這一幕展現的，是一個信任穩固，文明社會應有的常態：人們相信，行善是安全的，犯錯是可以被原諒的，而責任是應當被承擔的。

南京餘震的教訓是：提醒我們要用法律的嚴謹去守護公正。而悉尼的暖陽，無聲地告訴我們：一個文明的社會，是由無數條“刺青手臂”托舉起來的。

## 共品隨筆佳作，探尋人文之光

### 何與懷博士《參與弘揚人文精神》新書發佈會在悉尼舉行

（接上期）第三，促進東西方文化融合，賦予華文與華人世界更廣闊的普世價值。

正如剛才張導所指出的那樣，通過與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與融合，我們的華文文學得以昇華，同時也為整個華人世界注入了自由、包容與人文關懷等普世價值。

王斌發言結束後，唐培良介紹了《大地留印》第五卷的序言。

何與懷在序言中稱《大地留印》為澳華文壇“非虛構寫作的碩果”。唐培良說，過去徵集文章時，編者常常告訴作者：“我們不是文學，只是故事，我們要把真實故事留下來。”

何與懷卻指出，這些作品同樣屬於文學，是非虛構文學。

唐培良對此表示感謝。他說，《大地留印》記錄的不是虛構出來的人生，而是澳洲華人的真實經歷，是普通移民留給社會和後代的文化檔案。

隨後，他現場宣讀了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柯民思為《大地留印》第五卷出版發來的賀信。

賀信指出，《大地留印》系列彙集眾多華人移民的親身經歷和人生故事，真實記錄他們為現代澳大利亞發展所作出的貢獻。華人社區兩個多世紀以來不斷豐富新南威爾士州的社會、文化和經濟生活。書中的作品不僅銘記歷史，也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、尊重和交流，增進社區團結與融合。州長同時向澳洲新藝術聯合會、編者和全體撰稿人表示感謝，並祝願《大地留印》系列繼

續書寫新的篇章，為後人留下更多珍貴歷史記憶。

接着，作家山林女士發言。



在山林看來，何與懷博士既是澳華文學的重要研究者、整理者和推動者，也通過帶有證言性質的寫作，使華人在海外的個人經驗、中國近現代歷史記憶以及人類共同的人文價值建立起聯繫。

山林表示，自己過去更多是作為普通讀者讀書，而何與懷的文章和讀書活動，使她意識到閱讀還應具有另一層意義：通過閱讀認識歷史，通過歷史觀察現實，並對任何可能損害人性和人文精神的現象保持警覺。

山林認為，何與懷的作品始終具有明確的現實關懷。他通過書寫歷史人物和社會事件，使讀者重新思考當今社會的發展方向，也提醒人們不能忘記歷史教訓，更不能忽視人文精神曾經遭受的壓抑、傷害和摧殘。

何與懷並不是把歷史當作已經結束的往事，而是不斷追問：過去的經驗對今天意味着什麼？一個社會應當如何保護人的尊嚴？文學又應當怎樣保存那些容易被遺忘的聲音？

她最後再次祝賀《參與弘揚人文精神》出版，並感謝何與懷長期以來以閱讀、寫作和公共文化活動影響身邊的普通人。

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，何與懷所宣導的“參與”和“弘揚”，並不只是停留在書名中的概念，而是落實在一次次具體的閱讀、交流和思想啟發之中。

在多位嘉賓發言後，主持人終於請出新書作者何與懷博士。



何與懷首先感謝所有到場來賓。他說，現場人數超出預期，九十多個座位全部爆滿。有人從悉尼南區趕來，有人從藍山等更遠地區前來，讓他非常感動。

面對大家的讚揚，他笑稱：“剛才很多人給我講了很多好話，我都頂在頭上了。”

他隨後回顧了自己近期的出版情況。從上一年十二月出版一部研討會文集，到今年三月出版《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》，再到六月出版《參與弘揚人文精神》，半年時間裡已經出版了三本書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有兩本書準備在中國印刷，上下兩卷共約六十萬字。

何與懷以自己的經歷鼓勵現場作者：“其實只要動手，敢出版，就可以出版。”

他笑稱，作品銷路不是最重要的問題，也不必過多計算成本。重要的是，把自己應當留給世界的東西，把自己的想法、觀點、文采和人生經驗保存下來。即使市場反應有限，書進入圖書館，也能夠得到長期保存。

何與懷表示，澳大利亞華文文學近年來越來越受到世界華文文學界重視。

此前，許多北半球的華文作家和評論家對澳華文學瞭解不多，以為遙遠的南太平洋文壇相對沉寂。但當世界華文作家和學者來到悉尼、墨爾本參加活動後，才發現澳大利亞有許多優秀而勤奮的作家與研究者。

他說，有人以百萬字規模研究悉尼這座城市，有人多年持續記錄華人移民歷史，還有許多作家不斷推出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紀實文學和文學評論。這些成果說明，澳華文學並非邊緣性的存在，而是世界華文文學版



會後互動。左起：張華潔、夏曉瓏、李振國、恒心馬。

圖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。

何與懷鼓勵大家，只要願意動手、願意堅持，都能夠留下自己的作品和成果。

何與懷還提到，張華潔是一位重要導演，並談及他與李安、張愛玲研究之間可能展開的文化對話。他表示，現場視頻發言的淳子，是張愛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。李安將張愛玲的作品改編成電影后，文學文本與銀幕表達之間產生了許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。何與懷希望，張華潔與淳子未來可以舉行一次對談，從小說文本到電影改編，探討作品發生了哪些變化，哪些處理成功，哪些地方仍值得商榷。

這也體現了何與懷一貫的文化組織意識：一場發佈會並不只是一本書的終點，還可以成為下一場文學討論、藝術交流和文化活動的起點。

在發佈會結束時，人們所祝賀的已經不僅是一本新書的誕生，更是一種文學態度的延續：在異國他鄉保存母語，記錄真實人生，發現普通人的精神價值，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不斷尋找人文的光亮。

正如嘉賓所言，一本書有封面、目錄和最後一頁，但澳華文學的書寫沒有終點。

它仍在繼續。

（文字及照片由唐培良、姚建生、悠然、張華潔、恒心馬提供。）



何與懷博士新書發佈會部分與會者合照。